

郑振铎的弹词研究

郑振伟

【摘要】本文回顾郑振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弹词方面的论述，包括弹词始于变文，弹词和诗史的模拟，以及弹词的分类等，尤可注意的是他对于女性弹词的重视。郑振铎尝试开辟研究文学的新途径，包括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考、新材料的发现，以及中国文学的整理，他对弹词的研究是其所倡导研究文学新途径的示范，其中也应和着郑振铎的文学观——文学应是时代、社会和情感的真实表现。

【关键词】俗文学 弹词 变文 史诗 穆尔顿

一、前言

郑振铎(1898-1958)对“俗文学”的看法非常宽，以为它包括了通俗文学、民间文学，以及大众文学。在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的首章，他把俗文学和正统的文学放在对立的位置上，得出“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，于是‘俗文学’的地盘便愈显其大，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，凡重要的文体，像小说、戏曲、变文、弹词之类，都要归到‘俗文学’的范围里去”的说法¹。《中国俗文学史》于1938年初版，这种以雅俗，又或是民间的与文人的对立方式，仍见出陈独秀(1879-1942)《文学革命论》“三大主义”的影子，“曰：推倒雕琢的，阿谀的贵族文学；建设平易的，抒情的国民文学。曰：推倒陈腐的，铺张的古典文学；建设新鲜的，立诚的写实文学。曰：推倒迂晦的，艰涩的山林文学；建设明了的，通俗的社会文学”²。如果再参照郑振铎提出来的“俗文学”六大特质，包括“大众的”、“无名的集体的创作”、“口传的”、“新鲜的，但是粗鄙的”、“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……但也有其种种的坏处”、“勇于引进新的东西”³，也就更清晰。很明显，郑振铎是要打破以正统文学为尊的观念。

就文体而言，郑振铎所指的“俗文学”，包括：(1) 诗歌(民歌、民谣、初期的词曲等)；(2) 小说(专指话本：1. 短篇的，即宋代所谓“小说”，如“三言”；2. 长篇的，即宋代所谓“讲史”，如《水浒传》以及后来的《红楼梦》等)；3. 中篇的，如《玉娇梨》、《平山冷燕》等)；(3) 戏曲(1. 戏文；2. 杂剧；3. 地方戏)；(4) 讲唱文学(1. 变文；2. 诸宫调；3. 宝卷；4. 弹词；5. 鼓词)；以及(5) 游戏文章(俗文学的“附庸”，如《僮约》、《燕子赋》等)。由于所涉及的内容极多，故本文只取“讲唱文学”中的“弹词”为重点作一论述，以见郑振铎在弹词研究方面的开拓和贡献。

二、郑振铎的文学观和俗文学

车锡伦(1937-)指出“俗文学”这个概念来自日本，郑振铎是借用的⁴，而刘锡诚(1935-)也论及“俗文学”和郑振铎的渊源⁵。什么是“俗文学”？郑振铎认为是：

¹ 郑振铎，《中国俗文学史》(北京：文学古籍刊行社，1959年11月)，页1-2。

² 陈独秀，《新青年》(东京：汲古书院，1970-1971，复印本)，2卷6号(1917年2月)。

³ 郑振铎，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页4-6。

⁴ 刘锡诚主持，《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》，《民间文化论坛》，2005年5期，页4。关于「俗文学」一词，狩野直喜(Kanō Naoki, 1868-1947)于《艺文》第7年第1-3号(1916)曾发表《支那俗文学史研究の材料》(《中国俗文学史研究底材料》)，该文由汪馥泉中译，收入《中国文学研究译丛》(青木正儿等着，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30；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2年，重印本)。

⁵ 刘锡诚，《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——郑振铎、赵景深及其它俗文学派学者论》，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，25卷2期(2004年4月)，页48。该文引录吴晓铃《朱自清先生与俗文学》的原文，认为“俗文学”一词好像由郑振铎在《敦煌俗文学》一文中提出来的，吴文见《华北日报》“俗文学”第60期(1948年8月20日)。

代表时代的作品……在民间文学里也有不少。它们，特别是民歌、短剧、小说和戏曲，能够把当代的人民生活、思想感情，生动地具体地表现出来，成为最可宝贵的史料。它们和出于大诗人、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同样，乃是和它们的那个时代呼吸相同，血脉相通的。许多俗文学的作品，却总可以给我们些东西。他们产生于大众之中，为大众而写作，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，欢愉和烦闷，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，生活压迫的反响，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。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，另一种人生，另一方面的中国，和正统文学，贵族文学，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。只有在这里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、生活和情绪。中国妇女们的心情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、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。⁶

这段引文颇长，之所以不惮引录，那是因为全文显示出郑振铎一贯的文学观。郑振铎对于文学的看法，简言之，就是时代、社会和情感的真实表现。拙著《郑振铎前期文学思想》曾经以1927年作为郑振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，其中原因，就是他对于文学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民俗学和古典文学方面⁷。也许有人会生出疑惑，那就是郑振铎的兴趣为何出现这种转变。其实，对于国故的整理，只要检读郑振铎1927年以前发表的一些篇章，诸如《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》（《文学旬刊》，51期，1922年）和《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》（《小说月报》，14卷1号，1923年1月），便可理解整理中国旧文学的想法其来有自。

郑振铎在事业的发展，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，那就是1928年中旬从巴黎乘船返国后，他除了继续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外，也在复旦大学任教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的课程，到1931年应当时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（1893-1984）邀请任燕京和清华两所大学的教授，讲授中国小说史、戏曲史和比较文学史诸课程，自此便离开商务印书馆。1935年8月，郑振铎就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和教授，负责任教中国文学史和敦煌文学等课。然而，从新文学回到旧文学，并不意味着郑振铎文学观的改变。在“为人生而文学”和“为艺术而文学”的旗帜下，文学实也毋需作新旧之分。郑振铎曾将文学定义为“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‘想象’的‘表现’，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价值与兴趣的”⁸，这是就文学的性质而言，至于文学的使命，就是“表现个人对于环境的情绪感觉，欲以作者的欢愉与忧闷，引起读者同样的感觉。或以高尚飘逸的情绪与理想，来慰藉或提高读者的干枯无泽的精神与卑鄙实利的心境”⁹。结合上引郑振铎对俗文学的评价，以及1921年5月和6月在《文学旬刊》所发表的那两篇文章来看，足以说明郑振铎对于文学的看法根本没有改变，反而在文学的研究方面辟出新的方向。郑振铎在《中国俗文学史》首章的结处曾表示这项工作“我在十五六年前已经在开始准备着”¹⁰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

三、弹词的研究

郑振铎的弹词研究，始于资料方面的搜集，《西谛所藏弹词目录》应是最早出版的“弹词目录”¹¹。该目录见于《小说月报》17卷（1927年6月）的号外，共录弹词117种。后继者有凌景埏（1904-1959）的《弹词目录》，见于《东吴学报》3卷3期（1935年7月）；李家瑞（1895-1975）的《说弹词》第12节“现存的弹词”，见于《历

⁶ 郑振铎，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页20-21。

⁷ 郑振铎，《郑振铎前期文学思想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0年11月），页7。

⁸ 西谛：《文学的定义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5年6月），第4卷，页310。《文学旬刊》，第1号（1921年5月10日），第2版。

⁹ 西谛：《文学的使命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4卷，页315。《文学旬刊》，第5号（1921年6月20日），第1版。

¹⁰ 郑振铎，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页21。

¹¹ 《程守中所藏弹词目录》（民国抄本）应是更早的私藏抄本目录，该目录为北京图书馆藏本，共列弹词124项，钤有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章。参见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（近代卷）》（林夕主编，费雨山房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5年10月），第40册，页77-94。

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(1936年3月)¹²。至于胡士莹(1901-1979)在他们的基础上所编着《弹词宝卷书目》，出版时已是1957年了¹³。下文将列举郑振铎著述中与弹词相关的内容逐一分述。

(1)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

郑振铎在《小说月报》17卷号外(1927年6月)发表的《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》¹⁴，总结出中国文学研究的两大观念，一是“归纳的考察”，另一是“进化的观念”。郑振铎在《文学旬刊》51期(1922)发表的《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》¹⁵，已提出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，分别是“文学的统一的观察”、“归纳的研究”和“文学进化的观念”，在《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》一文中，郑振铎不再突出“文学的统一的观察”。至于这三项研究精神，其实都源于穆尔顿(R. G. Moulton, 1849-1924)的《文学的近代研究》，这部书郑振铎曾经写过书介¹⁶。在《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》一文中，郑振铎以为运用进化和归纳的观念，可以开发三个新的研究途径：(1) 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考；(2) 新材料的发现；(3) 中国文学的整理。郑振铎在文学方面的研究，大抵也是从这三个途径进发。

郑振铎所开列的三个途径，都有弹词的论述。就“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考”一项而言，他以为一些重要的民间文学，如弹词、佛曲与鼓词，都受到印度的影响，而这种外来的影响，较小说和戏曲所呈现出来的更为明显，所以郑振铎认为“弹词与鼓词却又是完全由佛曲蜕化而成的”¹⁷。这是郑振铎对弹词如何演化的基本观点，1934年发表的《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》，关于变文和弹词的关系，郑振铎便以为“也许，变文的讲说佛经的一支流行而成为宝卷，而其讲说史书、故事的一支却成为弹词了”¹⁸。1935出版的《文学百题》中，其中的《什么叫做“变文”？和后来的“宝卷”、“诸宫调”、“弹词”、“鼓词”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》，郑振铎也重申“弹词和鼓词在近代民间文学里有着很大的影响，且也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，他们也是以唱为主体的。没有可疑的也都是由变文蝉蜕而生的”¹⁹。

关于“新材料的发现”的一项，郑振铎所举的也是弹词，他以为“弹词，又是一种被笼罩于黑雾之间，或被隔绝于一个荒岛中而未为人发现的文艺枝干。弹词却并不是很小的或很不重要的文学枝干呢！”郑振铎列举出《天雨花》、《笔生花》、《再生缘》、《再造天》、《梦影缘》、《义妖传》、《节义缘》、《倭袍传》，以及“三部曲”的《安邦志》、《定国志》和《凤凰山》等，以为它们都是中国文学中的巨著，并评述“其描写之细腻与深入，已远非一般小说所能及的了。有人说，中国没有史诗；弹词可真不能不算是中国的史诗。我们的史诗原来有那么多呢！谈弹词的人，如今也还没有”²⁰。

至于最后“中国文学的整理”一项，郑振铎把中国文学分为九大类别，其中的第五类就是“佛曲弹词及鼓词”，郑振铎之所以把这些文类并置，那是由于“这三种作品，体裁都很相近，即都是以第三人的语气来叙述一件故事的，有时用唱句，有时用说白，有时则为叙述的，有时则代表书中人说话或歌唱。不类小说，亦不类剧

¹² 王秋桂编，《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》(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82年4月)，页73-101。

¹³ 该书目于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后经萧欣桥整理，于1984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。

¹⁴ 郑振铎，《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(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年5月)，第6卷，页273-298。

¹⁵ 郑振铎，《郑振铎文集》(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年6月)，第7卷，页3-12。

¹⁶ 郑振铎，《书报介绍·穆尔顿的《文学的近代研究》》，《小说月报》，第12卷1号(1921年1月)。这篇介绍，节译有该书的一种图表和目录。该书英文名称为 *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: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, 1905)。该书前七章后来由傅东华(傅则黄，1895-1971)译出，分别于《小说月报》17卷和18卷断续地连载，取名《文学之近代研究》。另穆尔顿有多种著述，译成中文者，除《文学的近代研究》外，另有《乔布记》(上海：广学会，1936年)。

¹⁷ 郑振铎，《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6卷，页288-289。

¹⁸ 郑振铎，《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6卷，页480。该文原刊于《文学》2卷6期(1934年)，篇名为《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》。

¹⁹ 郑振铎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7卷，页399。

²⁰ 郑振铎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6卷，页290-291。

本，乃有似于印度的《拉马耶那》，希腊的《依里亚特》，《奥特赛》诸大史诗”²¹。关于“史诗”的问题，郑振铎在《诗歌的分类》一文中，把它理解为“长篇的叙事诗歌”，该文把诗歌分为三大类，即抒情诗(lyrical poetry)，史诗(epic)和剧诗(dramatic poetry)²²。

将弹词和西方的史诗相提并论的，郑振铎并不是第一人，而最早的很可能是吴宓(1894-1978)。吴宓的《希腊文学史》长文见于《学衡杂志》13期(1923年1月)，他在该文的末段将荷马(Homer)的史诗与中国的弹词作比较，分十二点，而最后一点总结出“以其大体精神及作成之法论之，弹词与荷马史诗相类似”，并加夹注如下：

《天雨花》、《笔生花》等弹词，其出甚晚，其艺术颇工，然已甚雕琢，artificial，毫无清新质朴之气，与荷马大异。吾所谓弹词，非此类也。盖吾意中之弹词，乃今日尚见于内地各省随处飘流而登门弹唱者，吾幼时听之，甚为感动。²³

当然，吴宓所指的弹词并非那种供阅读的弹词，而是以叙述为主，语言又介乎雅俗之间的说唱弹词，他所举的例子有《滴水珠全本》(又名《四下江南》)、《安安送米》、《雕龙宝扇》(又名《五美图》)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潜龙传》、《钦命下江南》等。朱应鹏同样认为中国大鼓弹词可以和西方的史诗相比²⁴。往后陈寅恪(1890-1969)论《再生缘》亦云：“若其佳者，如再生缘之文，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。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，至少同一文体”²⁵，即就文体而言，中国的弹词足以媲美印度、希腊及西洋的长篇史诗。

(2) 从变文到弹词

《从变文到弹词》一文的主要观点，是把弹词分为读本和唱本两大类，而郑振铎尤其重视弹词作为女性的读物，誉之为“女子的文学”。关于弹词和女性的关系，郑振铎在其弹词目录的引言中，实已谈及其中一部分可以称为“妇女的文学”。

弹词有两种。一种是光看的……一种是实际弹唱的……中国女子自己为吐泄不平之气而作，又复为历来妇女间最流行之读物者，此为仅有之文体，如《天雨花》、《笔生花》等书，咸记女扮男装，中状元，出将入相一类故事，皆一种下意识的反抗，于想象中求梦境的满足。故弹词可认为女子的文学。……所惜今之文人学士，皆鄙宝卷、弹词为不足道，至今尚无人作专门之研究，致其源流演变之迹，湮没不彰。²⁶

该文并根据敦煌千佛洞所发现的“变文”作为证据，从其韵散相间，唱句以七言为主，杂以五言，六言，或三三四，指出唐代的变文虽然于宋代已不见经传，但“其精灵实蜕化于诸宫调、宝卷、弹词之中”²⁷。郑振铎于整理国故方面，曾提出新的精神：“‘无征不信’。以科学的方法，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”²⁸。尽管陈汝衡(1900-1989)、赵景深(1902-1985)、阿英(钱杏邨，1900-1977)等人专著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陆续出版²⁹，但

²¹ 郑振铎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6卷，页294-295。

²² 郑振铎，《诗歌的分类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4卷，页369-371。原刊《文学》，第85期(1923年8月27日)，第1版。

²³ 吴宓，《希腊文学史》，《学衡杂志》，13期(1923年1月)，页45。该刊各文独立编页，该文共48页。

²⁴ 傅彦长、朱应鹏、张若谷，《艺术三家言》(上海：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，1927年；上海书店复印)，页155-161。

²⁵ 陈寅恪，《论再生缘》(香港：友联出版社，1959年6月)，页85。

²⁶ 郑振铎，《从变文到弹词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6卷，页243。该文为郑振铎1932年10月14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稿。

²⁷ 郑振铎，《从变文到弹词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6卷，页245。

²⁸ 郑振铎，《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》，《郑振铎文集》，第6卷，页350。原刊《小说月报》，14卷1号(1923年1月)。

²⁹ 例如陈汝衡(1900-1989)的《说书小史》(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)、阿英的《弹词小说评考》(上海：中华书局，1937年2月)，以及赵景深的《弹词考证》(长沙：商务印书馆，1938年7月)等。

弹词在当时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园地，而郑振铎是持着“进化的观念”来探索弹词的渊源。五四前后对于弹词的论述都比较笼统，例如夏曾佑(1865-1924)从渊源的角度立论，得出弹词源于乐章，最后与小说合流³⁰；管达如(1881-1941)也将小说分为文言体、白话体和韵文体，在韵文体下再分传奇体和弹词体³¹。尽管这种归类的方式已见于前人³²，但如此弹词却成为小说的分支。又魏绍谦的《弹词文学》虽然也指出弹词有宜于弹唱和不宜弹唱两类，却把弹词、鼓儿词、滩簧、花调、打渔鼓、唱道情、打花鼓、唱莲花落等等全归入“弹词文学”³³。

(3) 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第十二章——《弹词》

郑振铎在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的第十二章辟专章讨论弹词，我们不妨先参看他在该章所列出来的“参考书目”，属于他的作品，包括《西谛所藏弹词目录》、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》、《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见》，以及《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数据的发现史略》，别人的著述包括谭正璧(1900-1991)《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》、赵景深《弹词选》、蒋瑞藻(1891-1929)编《小说考证合篇》，以及阿英《海市集》³⁴。郑振铎撰写《中国俗文学史》时，没有太多数据可供参考，而第十二章的内容来看，他对于弹词的看法也没有改变，除了弹词是从变文蜕化而来的观点外，女性和弹词的关系是另一个重点。

《中国俗文学史》中《弹词》一章共有六大部分，虽未见有小标题，但从内容看来，可以知道第一部分谈的是弹词体式；第二部分为国音与土音弹词的区分；第三部分举《绣香囊》、《安邦志》、《北史遗文》等国音弹词为例，分别说明只有唱文没有讲文的体式，刊本出现以前有钞本广泛流传的现象，以及讲唱历史的弹词；第四部简述《玉蜻蜓》、《果报录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三笑姻缘》等吴音弹词，并从《三笑姻缘》节录了一段颇长的原文，大概是要说明其中所保存的方言俗语；第五部分是女作家的弹词，举陶贞怀的《天雨花》、陈端生作和梁德绳续作的《再生缘》、侯香叶改订的《玉钏缘》、邱心如的《笔生花》，以及郑澹若的《梦影缘》；第六部分谈的是流行各地的弹词，如福州的“评话”和广东的“木鱼书”。

该章第二部分用“国音”和“土音”来区分弹词，是郑振铎的创举，而“土音”的弹词以吴音为主，广东的木鱼书也算入土音弹词。较诸同期的研究者，如李家瑞的《说弹词》(1936)则分为“代言体”和“叙事体”两类，赵景深的《弹词选》则分为“唱词”和“文词”³⁵。然而，从郑振铎所举国音弹词的说明，可以知道所谓“国音弹词”亦即“唱词”，只有“唱文”，没有“讲文”。郑振铎虽然从史诗的角度看弹词，但也同意弹词因戏曲的影响而出现唱白：

凡弹词都是以第三身以叙述出之的；即纯然是史诗或叙事诗的描叙的方法。但到了后来，又分出不同的组织的体式来。大约受了很深的戏曲的影响罢，在吴音的弹词里每每的注明了生白(或旦白，丑白)，生唱(或

³⁰ 别士，《小说原理》，见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，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·第一卷(1897-1916)》(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9年3月)，页60。

³¹ 管达如，《说小说》(1912)，见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·第一卷(1897-1916)》，页374；原刊于《小说月报》3卷8号。将弹词列作小说的类别，亦见于成之《小说丛话》(1914)，见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·第一卷(1897-1916)》，页415；原刊于《中华小说界》。“成之”可能就是吕思勉(1884-1957)。

³² 梁章钜(1775-1849)云：“小说九百，本自虞初，此子部之支流也。而吾乡村里辄将故事编成七言，可弹可唱者，通谓之小说”，引见《归田琐记》(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年8月)，卷7，页132。

³³ 魏绍谦，《弹词文学》，《北平晨报》，“北辰学园”副刊，1931年4月23日-25日连载。

³⁴ 谭正璧的《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》有上海光明书局1930初版，1931年补正版，以及1934年的增订版；蒋瑞藻编的《小说考证合篇》于193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是《小说考证》(1919年9月)、《小说考证拾遗》(1922年12月)、《小说考证续编》(1924年6月)的合编本；以及阿英《海市集》(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36年11月)；赵景深的《弹词选》，未能确定是否即《弹词研究》(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0重印)，该书有“导论”和“弹词选”上中下三卷，“导论”后记1937年6月)。

³⁵ 据赵景深的解释，“叙事的”称为“文词”，只能在书斋里看，完全是用第三身称作客观叙述的。“代言的”称为“唱词”，其中的一部分是在茶馆里唱给大众听的，除第三身称外，也用第一身称。见《弹词研究》(台北：东方文化书局，1970)，页6。

旦唱，丑唱)，表白(即讲唱者的叙事处)，表唱(即讲唱者的以叙事的口气来歌唱处。)等等，但在一般的弹词里却都是全部出之于讲唱者之口，并没有模拟着书中主人翁或特别表白出主人翁的说唱的口气的地方。³⁶

郑振铎和赵景深的意见大致相同，都以为弹词的叙述形式是先有叙事体，然后才有第一人称的代言体。

第十二章《弹词》虽然分作六部，但篇幅在比例上并不平衡，郑振铎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于由女性写作的弹词。该章正文共 35 页，女作家的弹词这个部分却大约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共 11.5 页，并集中讨论《天雨花》、《再生缘》、《玉钏缘》、《笔生花》，以及《梦影缘》等作品。郑振铎给予这些作品应有的重视，这和他的文学观是一致的，正如前引他在该书的第一章所述，“中国妇女们的心情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、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”³⁷。当然，由于时代所限，其中的某些观点仍有待补充，例如关于邱心如《笔生花》的论述，郑振铎以为“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留下那末多的自传的材料给我们的”³⁸，惟创作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虚构成份³⁹。

四、小结

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于上世纪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，而郑振铎的《中国俗文学史》是发轫之作。本文只集中讨论郑振铎的弹词研究，尽管郑振铎在这方面的篇章不多，除整理弹词目录外，就是《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》和《从变文到弹词》等文章，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的第十二章《弹词》要算是集其大成，而尤可注意的是他对于女性弹词的重视。郑振铎对弹词的研究，体现出他无征不信的精神，也示范着如何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途径，其中更贯串着他的基本文学观——文学应是时代、社会和情感的真实表现。

³⁶ 郑振铎，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页 349-350。

³⁷ 郑振铎，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页 20-21。

³⁸ 郑振铎，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页 378。

³⁹ 有关论述，详参拙文《为女性张目的〈笔生花〉》，见《九州岛学林》，4 卷 2 期(2006 年夏季号)，页 130-177。